



THE OUTER WORLD  
IN MODERN CHINESE EYES

萧乾

海外行踪

萧乾

# 海外行踪



THE OUTER WORLD  
IN MODERN CHINESE EYES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海外行踪

萧乾

责任编辑：钟叔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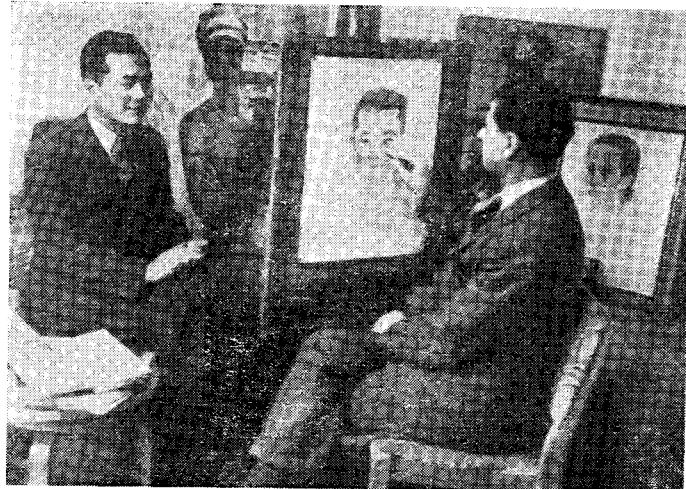
\* 198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5,000 印张：9.375 印数：1—26,500  
统一书号：11109·209 定价：0.92元



作者像

一九四一年在西班牙画家格雷戈  
里奥·普里哀托的伦敦画室内。



一九四四年在南德巴伐利  
亚省学滑雪。



一九四五年秋天在南德阿尔卑斯山颠

---

## 《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凡例

一、《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选刊1911年——1949年期间各界人士对外国直接观察的记述。丛书冠以“现代”一词，并不是以1911年作为划分近代和现代、以1949年作为划分现代和当代的时间界限，只是因为已经有了一部专收1840年——1911年期间出国载记的《走向世界丛书》，而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思想已经渐渐为许多中国人（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有条件对外国进行直接观察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了。

二、如果说，《走向世界丛书》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时的认识变化过程，那末，这部《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所反映的，便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带着中国的问题去观察世界形势，又从世界的全局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结果。世界在不断地变化，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这个过程到现在并没有完结，当然也不会完结。本丛书所能做的，是揭示若干个侧面和断面（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侧面或一个断面），使今天的人们能够对于这个过程做一点微观的研究，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具体的了解。

三、基于这个目的，本丛书采辑将不限范围，无论是社会政治之考察，文化学术之交流，实业技术之研究，风土人情之采访；亦不拘体裁，无论是旧版图书、报章杂志，以及书简日记、手稿遗文，只要有助于人们认识外国和中国，有益于历史文化的积累，皆可入选。

四、辑印旧作，凡作者健在者，均请作者加以校订，新写序言。凡作者已逝世或不在国内者，即按原文排印，只校正原来由于技术原因所造成的差错，文章和内容一般不加改削。有必要时，当然也可以附加一点评介文章，指出今天读者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尊重作者，更重要的是为了尊重历史。有的书和作者如有违碍，宁可暂时割舍，也不妄作改动，俾免有损原貌，贻误后人。因为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文字，有些事过境迁，当然与当今之报道不会完全一致，但其历史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此，谅亦为广大读者所能理解者也。

## 目 次

在洋山洋水面前(代序) .....	( 1 )
赴欧途中 .....	( 13 )
坐船犯罪记 .....	( 20 )
剑桥书简(一) .....	( 32 )
剑桥书简(二) .....	( 39 )
初访伦敦 .....	( 43 )
老伙计日记 .....	( 63 )
伦敦一周间 .....	( 67 )
血红的九月 .....	( 87 )
矛盾交响曲 .....	( 97 )
银风筝下的伦敦.....	(103)
一九四〇年的圣诞 .....	(114)
到莱茵前线去.....	(119)

南德的暮秋 .....	(132)
美国散记 .....	(192)
瑞士之行 .....	(205)
劫后的马来亚 .....	(220)
安南的启示 .....	(228)
*	
衣阿华的启示 .....	(237)
美国点滴 .....	(241)
在康奈尔校园里 .....	(262)
附录：访问记 .....	(268)

## 在洋山洋水面前(代序)

我这一生，路走得不算少。十八岁以前确实几乎没出过北京城圈。有一阵子我常赶着一群瑞士羊去放牧。羊贪婪地吃着草，我坐在土坡上，从树隙里望着天空缓缓移动着的白云和偶尔飞过的鸟群，就幻想自己长大了也能那么自由自在地飘荡翱翔。那时我特别喜欢“天涯海角”这四个字，看到它们，心里就感到豁亮宽敞，仿佛越是渺茫，越合乎我这个少年漂泊者的心意。

一九二八年冬天，我真地离开了古城，而且一下子就流浪到海棠叶的边缘——广东汕头，真可以说到了天涯海角。那并不是一次自愿的旅行，不过那次出走毕竟打开了我的眼界。从那以后，旅行背包好象就没离开过我的肩头。我简直是马不停蹄地走啊！从华北平原到滨海的闽粤，从黄浦滩走到大西南。正当欧洲天空战云密布、旅客们纷纷在船公司门前排队退票之际，我登上了一条空荡荡的邮轮茫然地向西方航去。这一去便是七年。我是在纳粹轰炸华沙那天上的船，第二天英国的张伯伦和法国的达拉第就相

继对德宣了战。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在沈阳燃起的战火，终于烧遍了东西两半球。

七年间，先是经历了纳粹对伦敦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大轰炸，接着，一九四四年希特勒又动起更尖端的杀人凶器——导弹和火箭。第二战场开辟后，我穿上一套不合身的棕色军装，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了。我冒着炮火，踏访了满目疮痍的西欧，又去北美转了一圈。战火熄灭后，我跑了一遭南德，去瑞士享了十几天清福，然后就搭上一条以上海为终点的英国货轮，漂了回来。

把这条船比作蜗牛一点也不刻薄，从东伦敦到黄浦滩，它足足走了三个多月。这怪不得它。一路上，码头的设施都被战争破坏得稀巴烂，有些港口布的水雷还没捞净。对我来说，航程的缓慢毋宁是一份好运道：战地的倥偬以及新闻业务的忙碌使我在伦敦压根儿也腾不出手来记下自己的一些见闻和感受。船“扭”出了地中海、红海，光在印度洋上它就足足漂了九天。这就容许我补写了几篇通讯。船到新加坡，一停就是一个月，这又为我提供机会去访问一下战后新兴的马来半岛。

\*

在英国那些年，我也跑了不少地方。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英国的进步友好人士组织起一个援华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他们曾往解放区运送过医疗器材，也是当时由斯诺及艾黎等人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英国有力的赞助者。这个组织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应英国各地的要求，派人去宣传中国的抗战。一九三九年我一到英国，立即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名特约讲员。这样，教课之余，我就不时地赴英伦三岛大城小镇去从事这种义不容辞的宣传工作：一下子是苏格兰北端的阿伯丁，一下子又是南威尔士的矿山；在这里讲讲中国新文艺运动，在那里谈谈滇缅公路。演讲当然是尽义务，没有也不应有报酬；但援华会照例给买好一张往返的火车票，抵达后有人招待膳宿，负责接送。最初，一个月只旅行一两次。一九四一年后，中国同学陆续走光了，我几乎成为全英唯一来自国内的中国人。这种“演讲旅行”就更加频繁了，很少有一个星期不走一两趟的。

这种工作很累人。首先，得准备讲稿。当时手头除了《大公报》，带去的书不多，讲稿都得七拼八凑，反正统统是宣传抗日。写出几篇之后，每篇都可以用上几遍，甚至十几遍；而且越讲越熟，讲上一两次就用不着看稿了。最麻烦的是讲完之后，还不得不应付听众的提问。碰上不友好的、甚至别有用心的家伙，会死死纠缠，几乎能把人气炸了肺，可还得捺住性子，用英国讲坛上通用的那种不亢不卑的语言应付。例如一九四〇年丘吉尔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竟悍然封锁我国在抗战中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路。我曾采访过那条公路，所以援华会多次要我去讲。提问时，居然有人起来为这种国与国之间赤裸裸的不义行为进行狡辩。可喜的是，听众中间主持正义的也总不乏其人。他们有时甚至抢在我前头去痛斥那些为虎作伥者。

通过这种方式，我在英国踏访了许多地方，也在英国社会各阶层结识了不少朋友：医生、牧师、工会积极分子以及政府公务人员。但这种工作来去匆匆，一般是不便游山玩水的。总是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离去之前也只浏览一下市容。但那毕竟比守在伦敦公寓或剑桥书斋里更能增加对英国社会的了解。

英国人也喜欢利用名胜作会议地点，尤其举办艺术性的活动。我参加过两次音乐节，一次在英格兰首府爱丁堡，一次在英国西海岸一座名叫达廷吞堂的古堡里——戴爱莲就是在那里学习舞蹈的。座落在艾冯河畔的莎翁故乡斯特拉福德，每年都举行戏剧节。留英中国同学会也总是选个名胜古迹来开年会。

一九四〇年春天那段日子有些莫名其妙。欧战爆发已半年，但西线仍平静无事。希特勒的飞机炸完了华沙之后，好象就都入了库。据说戍守在马奇诺战壕里的法国士兵甚至种起玫瑰花来了。那阵子和平的谣言不断从欧陆上吹来。那是我出国后度过的第一个春天。经历了寒冷、阴暗而多雾的冬天，剑河两岸的石南和番红花怒放了，太阳把剑桥的中古建筑镀成古铜色。这时，牛津的杨宪益兄倡议去英国中部以湖畔诗人故居闻名的湖区去旅行，我欣然参加了。这一行有杨兄的英籍女友戴乃迭和十来位中国同学，我们个个背上爬山背包，在葛拉斯密尔站下了火车，就攀登起那群崇山峻岭了。三七年春游雁荡，最想一睹的是山顶上的雁湖奇景，而这种山顶湖我们在英国湖区看到不知多少

座。当我们正在温德密尔一带巉岩上挣扎时，遇上了一场暴风雪。那真是壮观！晴朗的天空本来只飘浮着小小几朵白云，顷刻间狂风大作，卷起的雪花铺天盖地，把宇宙变成白皑皑的一片。山路以及一切路标全埋住了，赖以指路的地图变成一张废纸。尤其严重的是旅伴被风雪吹散，相互失掉了联系。我孤身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爬，担心那天真要葬身乱石白雪间。夜晚大约九十点钟才远远望到山谷里有灯光。一杯白兰地下肚，真赛过仙浆。幸好客栈就在酒馆楼上，梦里还迷失在雪山中。

从湖区归来不久，纳粹就在北欧真地动手了。暴徒势如破竹地闯进了法境，长驱直下，拿下巴黎，一气冲到西海岸。当时，英伦三岛已濒于兵临城下的境地。也正在这时，我看到一个民族临危不惧、破釜沉舟的英勇气概。

第二战场开辟之前那段日子，英国又沉寂下来。其实，战火那时正在伏尔加一顿河流域猛烈地燃烧着。我那阵子患起严重的神经衰弱，医生嘱我要多外出旅行。这时，朋友教给我一个廉价旅行的窍门。原来英国有个为便利穷学生和低收入职工而成立的全国旅游性组织，叫做“青年寄宿舍”（Youth Hostels）。每年只要交五先令就可以成为会员。它在英伦三岛大小城镇均设有寄宿点，大都是些简陋的房子，有时甚至是工业革命后荒废了的磨房。出发之前，凭会员证可以向沿途寄宿点预订床位——真只是“床位”，而且是木板钉成的上下铺，但供给早晚两顿简单饭食，只是必须帮厨，如削削土豆皮或端洗盘碟。有一点和旅馆

不同的是：早晨八时必须走人。不过住一夜旅馆至少要十先令，而且还得付小账；寄宿点只收一先令，没有小账。在寄宿点上，可以遇到真正属于底层社会的英国人。他们不懂繁文缛节，不扎蝴蝶结，也不会打绅士派的官腔，还时常开些粗野的玩笑，但他们真挚爽快，一点不矫揉造作。一九四二年春，我就同林苍佑君（马来西亚独立后，任槟州首席部长）用这种方式走遍了苏格兰高原。

\*

路走了不少，但东西写得确实不算多，这只能怪自己疏懒。身边一直保存了几本那个时期的日记，原是指望老到什么也写不出来时再拿出来“零售”的，不料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大火中一道焚毁了。

这是我第三次整理自己所写的海外旅行通讯了。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江湾编《人生采访》时，我着眼在“时间防腐剂”上，有些国外通讯由于时过境迁，就没收进去。一九七九年编散文特写选时，象《瑞士之行》那几篇也没收进去，选入的《南德的暮秋》等十篇，也作了程度不同的删节。一九四七年编集子时，手边《伦敦一周间》的剪报不全，所以改成《三日记》了。这次承香港的卢玮銮女士及北京的鲍霁同志帮忙，把其余的四天补齐，同时，还帮我从旧《大公报》上又复制了几篇。我在编此集时，还恢复了一些删节的部分。这里应向读者作个交代。

\*

这套《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的编者在约稿时曾特别

向我强调，这不是文学丛刊，首先考虑的不是艺术性，而是要尽量真实地反映中国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外国的观察及印象，想从一些侧面或断面来记载和反映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以及战后最初的一年（也即是本书主要描述的七年）本身，可以说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是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一个中国人，又是个记者。在那七年间，我写下了这么一些通讯，把这份文字记录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想必也有其意义。

一九七九年我编自己的散文特写选时，对收入的有些通讯所做的一些删节，大部分是为了使文章更紧凑些——年纪大了，对自己过去行文的松散越发感到不耐烦。然而有些删节则是出于对梁效先生的防范。这次重订旧作，多少也标志着几年来我个人在认识上所起的一点变化。

梁效这位仁兄并不是六十年代后期才突然自天而降的。他老早就躲在马列主义大旗后面，成天摩拳擦掌，吹胡子瞪眼睛，象鹞鹰在原野上空盘旋捕食猎物那样，在人民队伍里制造混乱。正如鹞鹰是食肉的禽类，梁效也是专靠在旁人脊背上只脚来发迹的。他不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人论事，不理会文章的整体命意和逻辑，只截取其中一言半语，然后往他预先搭好的架子上这么一套，于是就完事大吉。他穿了一身特制的盔甲，总是豪迈地扬言要同一个被剥得赤条条的人较量。我砍掉那些议论，一半就是为了提防这位仁兄。

三年来党的文艺政策越来越使我相信，那位以捍卫党